

水族经济行为的 文化解释

蒙爱军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水族经济行为的 文化解释

蒙爱军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族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蒙爱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民族经济研究)

ISBN 978-7-01-009340-6

I. ①水… II. ①蒙… III. ①水族-经济行为-研究-中国 IV. ①F12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224 号

水族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

SHUIZU JINGJI XINGWEI DE WENHUA JIESHI

蒙爱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21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9340-6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经济行为的理论溯源	1
一、凸显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及其局限	1
二、经济行为分析的理论转向	6
三、水族文化特质综合体及其经济行为特征	12
第二章 经济行为及其文化解释	25
一、行为的意义及其分析维度	25
二、经济与经济行为	38
三、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	51
第三章 水族经济行为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塑造	60
一、水族社会的国家化进程	60
二、水族社会的宗族组织结构	70
三、水族宗族文化特质及其对水族经济行为的塑造	79
第四章 水族社会经济结构及经济行为特征	90
一、以水稻种植为主与多种生产并存的生计方式	90
二、传统水族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	100
三、水族农耕社会中“生计安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指向	105
四、注重社会关系的经济行为	111
第五章 水族经济行为中的文化认知体系	121
一、水族小农经济行为中的认知体系	121

二、水族的水书及其内容	130
三、水书认知体系与经济行为	136
第六章 水族人的思维方式及其经济行为的合理性	151
一、理性的多重意义及现实理性	151
二、水族文化与水族人的现实理性	161
三、恪守传统与吸纳新事物	174
第七章 水族经济行为与文化的制度性关联	179
一、制度与经济行为	179
二、水族社会中的礼及其制度化意义	186
三、水族传统社会中的财产制度与经济行为	191
四、作为规范系统的水书及其制度的关联性	199
结束语	208
附 录	210
参考文献	222

第一章 导论:经济行为的理论溯源

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与人的活动、行为联系在一起。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对行为的关注仍然在不断增强。在现代经济学中,以个人最大化理性、稳定偏好、市场均衡等基本假定为基础的经济分析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看做是以经济行为为核心的经济体系。^①甚至可以说,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就是用经济行为的观点解释、分析人类的各种行为(贝克尔)的。经济学的场域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的行为始终是一个“在场”。然而,经济学在追求其科学性的时候,由于对逻辑和数学处理技巧的过分偏爱,常常会偏离它的主题,偏离对人的关注,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一、凸显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及其局限

作为现代社会一门学科知识而繁荣的经济学,最早是以古典政治经济

^① 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认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的原理为其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把对控制经济生活的人类行为心理的某些观察作为研究起点。”([美]弗兰克·H.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9—50页。)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也说:“如果不对人类的行为做研究,这样的经济理论是有误导性的。”([美]莱因哈德·泽尔腾:《有限理性与经济行为》,载《南开管理评论》,2004年第2期。)思拉恩·埃格特森(Thrainn Eggertsson)在《经济行为与制度》一书中就是以经济行为的视角而对人类制度进行分析的。([冰岛]思拉恩·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吴经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页。)尚处于热潮之中的行为经济学,更是强调行为的视角,通过实验来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状态下如何在特定心理规律驱使下作出判断和决策。

学的形态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虽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在《国富论》中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确立为经济分析的基础,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分析生产者行为的基本范式,但在边际革命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还是一种客观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把主体抽象掉,以探讨客观的、独立于人的经济规律为目标。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的客观分析开始的,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价格仅仅是一种表象,在价格表象背后必然隐藏着支配和决定价格的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价值。那么这个隐蔽的价值怎么衡量呢?要么就以它的表现——本身价格来衡量(如后来的经济学所用的边际分析方法);要么就寻找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来确定它,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是后者,人们找到的衡量尺度就是劳动时间,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它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政治经济学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强调社会关系的意义,把自己的对象瞄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上,即研究生产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其所决定的生产支配权和产品分配权的关系问题。尽管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存在着种种的分歧,“但他们对某些基本问题都持相同的看法。他们都集中地揭露了在许多不同经济体制下支配剩余价值再生产的规则,他们还对欧洲资本主义中剩余价值再生产的分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①。

19世纪下半叶后,经济学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门格(Carl Menger)和瓦尔拉斯(Marie Esprit Léon Walras)等人的著作相联系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按惯例,以下简称经济学),一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化研究倾向,把研究重点放到个体选择的分析上,这一转变被称之为边际革命。这种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又被称为一种主观价值论,其核心概念有“最后效用程度”和“稀少性”等,他们关心人的欲求和满足,并力求研究在人的欲望无限化情况下有限资源如何来满足人的需要的问题。它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及人的活动,它把以往以剩余价值

^① [英]C. A. 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杜杉杉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再生产分析为核心的理论取向,转移到了对个人选择的分析上来。这样,经济行为就进入经济分析的视野中,成为经济学理论始终关注的中心,经济学也就成了研究人类各种行为的科学。用贝克尔的话说,“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①。

但经济学并不仅仅停留在行为的转向上,它要演变成为一门科学还必须要有和其他学科类似的基本假定和特有的研究方法。按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说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由经济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种假定有机构成的。^②其中,经济人的理性最大化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它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在后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杰文斯、门格和瓦尔拉斯等人推动下,成为构建整个经济理论的基点。基于经济人的假说,基于价格和商品量等维度与它的一套“经验—理论”符号体系,借助于它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逻辑严整的理论大厦。如果说,近代自然科学是从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其研究范式首先由力学完成,那么,以主体活动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则是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其学科范式是在经济学领域内实现的;如果说,牛顿力学是从惯性的抽象化假定中建立起来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从经济人的抽象和假设中建立起来的。牛顿力学把物体抽象为质点,撇开了物体的大小、形状、颜色、硬度等一切属性,只保留惯性;经济学也把人的各种复杂属性抛开,只保留经济利益(或偏好)这一唯一的属性。自然科学以揭示客观^③事物的不变性、规律性为己任,讨论的是“是”(be)的问题。当然经济学也以客观规律的认识为基础,也通过实验等方式寻找目标函数(效用函数或其他函数),但它侧重于寻找变量的最优值,确定目标函数是否达到最大。也就是说,经济学旨在于寻找人类活动的最佳性,是一种选择理论,讨论的是“应

① [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冯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参见[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冯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③ 当然绝对与人无关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客观主要是指既依赖于主体,又不依赖于主体的变换,参见蒙爱军:《维度之维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3期。

该”(ought)的问题。尽管如此,经济学也以其特有的方式,以一种逻辑严格的、近乎自然科学的方法,进入到主体活动的研究领域,并确立了其研究范式。

正是借助这样一个逻辑严整的理论大厦,经济学以一种席卷天下之势向其他学科强力渗透,并获得“社会科学皇冠”、“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类的殊荣。它不仅把这套符号体系和分析工具应用于普遍市场化的社会,也应用于非市场的社会,用于人类一切行为的分析和解释。这一方法及其分析技巧由保罗·安·萨缪尔逊(Paul Anthony Samuelson)和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加以发展和完善。萨缪尔逊的方法是:把一个正在作出理性选择的人所面临的可选择的东西叫做“变量”,把他面临的不可选择或一时不可改变的那些东西叫做“参量”。然后通过一定的方法实验地找到其效用函数,或其他的什么目标函数,在给定的参量下(这些参量往往通过某种联系约束着变量的取值范围),寻找变量的最优值。这些最优值叫做“解”。下一步是验证这些解是否确实使目标函数达到最大,那些检验条件叫做“二阶条件”。最后一步叫做“比较静态分析”,就是稍微变动一下参量的数值,看看解是怎样变化的,由此而通过实证观察来验证的命题。此后,这种研究方法又由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发挥到极致。加里·贝克尔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方法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课题统统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由于社会经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和把握经济活动的多维性,西方经济学又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中:追求所谓严格的“科学性”和数据上的经验实证性,并没有让经济学真正走到经验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程度,它既达不到解释的完备性和预测的准确性,也达不到操作层面上的精确化。同时,经济学为实现所谓的“科学性”而进行的高度抽象,不仅把一些对非经济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素,即那些对经济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的、心理的因素剥离了出去,也把一些本来是经济的东西赶出了经济学大门。我们知道,现实的经济行为不仅受物质利益的驱动,更是社会文化之中的经济,受多种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支配和影响。这些因素一旦被

抽象掉,就会产生许多所谓的“反常”现象,无法在传统经济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理论与事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在各个经济流派之间的吵吵嚷嚷、轮番表演中,人们发现,经济学并没有达到那种想象中的科学化的程度。

但经济学所面对的困境还不在于它缺少多少的科学性,恰恰相反,在于它对自然科学式的“科学性”的过度追求,在于它对经济行为人的过度抽象化,把人简单理解为抽象的经济人或理性人,从而忽略了对人的全面关注。虽然经济学经历了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到后来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理性人假设的转变,并以此来避开人们在人性方面问题的质疑,并保证其理论的逻辑严整性。然而,在实现体系完美、逻辑完善的同时,经济学与现实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远离了早期曾被马歇尔视之为经济学出发点的人。曾因为关注人和人的活动而获得勃勃生机的经济学,今天由于它对逻辑化、数学化的过度追求,具体的、活生生的,有情感、有意志、有理想和有道德的人就被遮蔽了。不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还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理性人,都以孤立的、抽象的个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无法全面地观察和解释现实生活中人的经济行为。正如道格拉斯·C. 诺思(Douglass C. North)所说的:“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①事实上,追求最大化原则也只是人们在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采取的特定行为选择,并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原则。经济行为主体也并非总是考虑个人利益的,在很多时候,他们更为关注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问题,并为一定的社会文化所支配。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均衡经济学的静态方法、最优行为、完全知识假设,以及将文化、制度、企业家与所有其他与人类经济行为相关的人类特质排除在外的做法,在学术上陷入了死胡同。

^① [美]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页。

二、经济行为分析的理论转向

以人为出发点的经济学,最终还是要回到对人的关怀上,回到对现实经济行为的关注上。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就是从人的意义——自由自觉实践基点开始的,他将历史理解为一个通过劳动(实践)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①。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②。不仅是马克思以人和人的活动(生产)为出发点来理解政治经济学,西方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J. B. 萨伊(Jean Baptiste Say)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讲到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学问的时候,就提出“经济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③。马歇尔在谈到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学科的同时,也强调“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④。对于前者,其基本假设是,“个人在使用手段适合于目的时具有合理性。……但是,这个成分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关于财富的研究不可分割地和另一成分即‘关于人的研究’——一种关于活动与生产和获取财富过程之间关系的理论——交织在一起的”^⑤。可以说,在经济学场域中,人和人的行为始终是一个“在场”。因此只有在对人的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人的活动、经济行为等概念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③ [法]J. B.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页。

④ [英]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页。

⑤ [美]T.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505页。

一个真切理解。^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还意味着,自由和自觉必须与“活动”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它们必须存在于活动之中。^③这就是说,人的本质,作为活动,不是片面的、局部的,而是系统的、整体的;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历史的。人的历史就是一个人的本质不断展开,不断实现的过程。正如马克思讲到工业化的生产实践时所说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④。在人的各种活动中,经济活动具有基本的意义。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人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这样做,应该怎样做等问题,也就随之而出现了。于是,人的经济活动也就获得了经济行为的表达。

这样,经济行为主体,即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自由自觉的人,就不仅仅是逐利活动中实现利益的工具,他更是彼此共享生存意义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是具有多样性与全面性的主体。而这种多样性与全面性,绝非最大化理性的抽象所能包容的。因此,只有借鉴和采用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在学科之间建立起跨学科联盟,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行为的研究才不至于被自己所追求的完美“科学”体系所窒息,才能找到挣脱形式主义束缚的可行之路。经济学向博弈论、心理学、行为学、意义分析等方面的转向,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深度介入,正表明了这种趋势。

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经济行为,但在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中,对行为及经

① 康德在他生前没有发表的《逻辑学讲座手册》中把哲学的范围划分为以下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则回答第四个问题。”康德又补充说:“从根本意义上说,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与后一问题相关。”([德]马丁·布伯:《人与人》,张见、韦海英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③ 蒙爱军:《对人的本质的再认识——自由与自觉之维》,载《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济行为概念本身的分析和讨论却并不多见,这方面的工作反而是由经济学之外的诸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来做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明确讨论了经济行为的概念,他认为只要当它根据其所认为的意向,以设法满足对有效效益的欲望为取向时,就应该叫做“以经济为取向”的行为,即经济行为。^① 韦伯还讨论了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情绪的、传统的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四种情况^②,并区分了工具、选择、规范三种合理性行为。其他社会学家虽然注重于一般意义上的行为分析,但他们的很多见解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讨论了行动(行为)参照系的问题,他认为“这个参照系实际上就是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不能再简化的基本框架”^③,并把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作为行动结构的基本成分,即作为行动参照系的基本维度^④。帕森斯的研究无疑为经济行为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框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根据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把行为归为目的论的、规范调节的、戏剧的和交往四种行为(行动),并借助语言学的分析来理解这几种行为模式,进而确立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看来,虽然在前三种行为模式中,语言理解都可以被引进为行动同步化的一种机制,但是,在以上三种行动模式中,语言往往是各按不同的角度被片面构思的。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与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象征性内部活动论、维特根施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活动观点、奥斯汀(John L. Austin)的语言活动理论以及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解释学等社会科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注意到了语言的所有职能。交往行动模式把语言作为直接理解的一种

①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页。

②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③ [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26页。

④ 参见[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27页。

媒体,在这里,发言者和听众,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① 哈贝马斯借助交往的模式、交往的行为结构、交往的社会规范及交往活动本身的分析,一方面,以此而实现对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交往层面赋予行为以新的意义,并借交往的本体化给广泛存在于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合作、博弈以一种新的注解。

由于行为概念与心理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心理学向经济学的渗透在所难免,并由此催生了行为经济学的诞生。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也因在行为经济学上的卓越成就而获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从行为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和经济活动,它侧重于分析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础,借助于对行为体的心理分析,借助于心理实验,同时也汲取了不完全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经济学研究成果,提出很多与新古典主义理性最大化假设不同的结论出来。卡尼曼和特弗斯基(Amos Tversky)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了许多有关个体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修正传统经济理论关于人类行为的某些公理性假设。在行为经济学看来,新古典主义的理性最大化假设需要用当代心理学关于人类认知局限性的研究成果来加以修改,并要充分考虑市场中的当事人所具有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并不仅仅受利益的驱动,还会受到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导致现实中出现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导致经济预测出现较大偏差。比如,在主流经济学中,偏好被认为是独立的,不会被个人当前的资产状况所影响,但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偏好不是一套事先就定义好的无差异曲线,而经常是不清楚的,具有高度可延展性,并与周围情况密切相关。这种与周围情况密切联系的偏好被称为引出偏好,许多研究都表明,引出偏好对行为结果有着惊人的影响,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完全的“偏好的反转”。一些在传统偏好理论看来不应该起作用的因素,事实上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新古典主义的预期效用

^① 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徐崇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35页。

等理论,行为经济学也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解释了生活中许多有关理性选择与现实背离的现象。^①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并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人们的推理系统地违背了概率原则。

处于前沿领域的文化演化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人类行为而进行的。《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想法》一书的作者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希望在行为的意义上统一经济学和社会科学。^②桑塔费学派的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和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人围绕着广泛存见于人类社会的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展开其研究,他们提出了“亲社会性之谜”的问题。按照纳氏均衡,囚徒困境的均衡点应该在不合作上,当把囚徒困境类比于人类社会,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合作比不合作更有利,但搭便车又可以获得高于合作的利益,于是博弈的均衡点应该是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不合作,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合作事实表明,人类是偏离博弈均衡点的。为了破解“亲社会性之谜”,桑塔费学派运用了不同于瓦尔拉斯范式的“演化和行为”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并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公共品博弈、偷袭者博弈、劳动市场博弈等实验,说明了人类行为并非像现代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那样,只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们在物质收益之外,更关注公正和互惠,愿意为修正物质利益的分配而承担个人损失,同时奖励那些以合作态度行事的人,惩罚那些不合作的人,尽管这些行为对于自身来说代价不菲。也就是说博弈双方的共同知识不是主流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而是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③他们强调个人、社会和经

^① Kahneman, D. and Tvei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 metrics*, 47(2): pp. 263 - 291.

^② 参见[美]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想法》,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③ 参见[美]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想法》,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济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并广泛借用包括脑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成就^①,希望通过多学科相互补充与协作,把包括经济学、人类生物学、社会学、行为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内容在内的人类行为科学统一起来。

由于实际的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所衍生出来的变量,其结果更具不可预期性,纯经济理论就不能不考虑文化之于经济的深刻意义。人类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都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物性反应活动,而是一种意义寻求或有意义的行为。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还必须把它放到社会文化理性实践系统中,在象征意义图式中来理解,人类学刚好担当了此任。在人类学领域中,人们对经济行为概念的专门讨论虽不多见,但人类学家给我们提供的大量具体材料,特别是他们对不同社会文化系统下的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比照研究,使人们能发现、揭示和理解很多不同于市场化社会的各种经济行为,进而对人类的经济行为的理解更为深入和全面。

在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将探询的目光投向了非西方社会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同时,也对西方经济观念进行反思,以求揭示西方经济模式的文化局限。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y)、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莫斯(Marcel Mauss)、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所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的事例及他们对经济行为相关问题的讨论,都揭示了经济行为绝不仅仅是利益最大化选择。如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圈的经典研究就深刻地说明了,在人类社会还存在着许多西方经济学的纯经济理论无法理解的包容了象征—仪式、社会关系、文化传统的复杂交换体系。莫斯对在“礼物”的分析中,以丰富的民族志资料,提出了以“整体性呈赠”为特征的“礼物经济”概念,其根本问题是要探究人是如何与物以及通过物而与他人彼此互相关联的。^②

^① 参见[美]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想法》,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8页。

^② 参见[法]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3页。

此后的波兰尼(Karl Polanyi)、科迪尔(C. Codere)、博汉南(P. Bohannan)等人对非西方经济现象独特的人类学分析,不仅为人们理解非西方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使人们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具有很大差异的文化下的不同经济行为和经济形式。格尔茨则借用了韦伯等人的解释社会学的相关假设和研究方法,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与视野——一个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象征行动论为中心的文化理论和解释人类学的视野。^① 格尔茨还认为运用“游戏类比”、“戏剧类比”、“文本类比”和“谈话类比”等方法去研究人类的行为或社会人文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将杂乱无章的社会人文现象“看成”有秩序的东西,使我们在人文社会的文化脉络中,解读人类行为的密码——一种存在于无意识结构中,并通过象征性行动表现出来的意义。格尔茨虽然没有直接对经济行为进行分析,但他对一般人类行为所做的文化解释,给经济行为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因此,只有借鉴和采用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在学科之间建立起跨学科联盟,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行为的研究才不至于被自己所追求的完美“科学”体系所窒息,才能找到挣脱形式主义束缚的可行之路。经济学向博弈论、心理学、行为学、意义分析等方面的转向,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深度介入,正表明了这种趋势。我们看到,以人为核心,以人的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正在努力克服原来体系所呈现出来的僵化、形式化倾向,以多学科的交叉、联盟而展开其进路,走向它的未来。

三、水族文化特质综合体及其经济行为特征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总是存在于以一定价值体系为导向的文化汪洋大海中,文化的核心就是通过符号的建构而确立某种价值共意,提供解释系统,以确定经济行为的意义及其合理性。但文化又是有差异的,文化

^① F. Keys Charles, *Weber And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2, p. 233.